

# 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

◇ 杨光斌

## 一、现代化道路

现代化道路按主导现代化的政治力量去划分,最为客观。中国现代化道路是共产党领导进行的。党领导的现代化道路至少有以下意义:

第一,高组织性。我们知道,现代化就是权力分散到权力集中的过程,组织化是推动现代化的重要手段。以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而组织起来的新中国,其组织化程度比西方更高,其竞争优势更突出。

第二,强大的治理能力。在“求解放”的战争年代,各级领导人都是大浪淘沙的结晶,其对政治的理解和操作具有高度的实践智慧。在谋发展和求富强的进程中,中国政治家集团都是“宰相起于州部”的过程,学习能力积累了高超的治理能力。不可忽视的是,中国自先秦时期开始,就有“致治”传统,历朝历代马上打天下也能马下治天下。文明基因很重要。

第三,发展的连续性。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保障了国家发展的连续性,避免了西方党争民主导致的政治周期陷阱。

第四,人民政治。共产党不但是一个阶级政党,也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政党,而且其群众基础是以民众为主,这些决定了共产党的人民性,党性和人民性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人民性政党的性质,决定了其现代化方向的独特性。

## 二、现代化方向

现代化是人类发展的目标,但是谁的现代化、为谁的现代化?现代化道路的差异性决定了现代化方向或现代化政治价值的不同。望文生义,社会中心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强调的是个体权利,流行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资源分配是竞争式乃至对抗性竞争,

从而导致了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和世界政治中国家间更严重的不平等。这种现代化所以能维持,是因为国内现代化进程中对外实行殖民掠夺,以弥补国内阶级对立而导致的资源分配不均问题。也就是说,由于时代不同,后发国家的现代化不可能靠对外战争去完成,社会中心主义现代化道路是不可复制的。

然而,基于这个现代化道路而形成的社会科学理论依然具有宰制性。根据沃勒斯坦的研究,三门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直到20世纪上半叶,95%的学术研究都是在仅仅5个国家中进行的——英国、法国、美国、德国和意大利,而且它们也主要是研究这5个国家。95%的知识存量为二战后的冷战提供了充足的弹药。冷战是意识形态战争,因此冷战时期的社会科学堪称“冷战社会科学”尤其是“冷战政治学”。在这个过程中,对立的两极都给对方贴上标签,西方以民主—专制二分法建构起“冷战政治学”。在萨托利看来,战后西方社会科学的最大成就是把“自由”和“民主”两股道上跑的车拧在一起,建构出自由主义民主理论,并被鼓吹为“普世价值”。

比较而言,政党中心主义的现代化必然是“为人民服务”的政治价值。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政治文明的传承者,党的组织原则即民主集中制有效地维护了自古以来的大一统政治。大一统政治要求,国家必须得到有效治理(即“致治”)而获得人民爱戴即民心。反之亦然,致治获得民心才能维护大一统。致治、民心事实上都是民本主义范畴。不同于过去的主要体现为思想性的民本主义,今天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本主义还有了制度基础——群众路线和协商民主。这样,政治价值上的人民性不但是为了人民,人民不单单是个客体,还要依靠人民,让人民组织起来以发挥能动性。比较而言,大多数国家

的发展都是精英阶层主导的,群众路线基础上的协商民主所动员的人民的主动性,无疑是推动国家发展的一种巨大能量和社会力量,这种作用虽然还难以通过统计的方式来评估。

### 三、现代化方式

西方所有国家的现代化都离不开战争与掠夺。这是因为,西方的现代国家起源很晚,16—17世纪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也开启了现代化历程。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有两条腿,一是在欧洲内部“战争制造国家”,罗马帝国后成千上万个城邦国家经过千年的连绵不断的战争,最终打出来30几个民族国家。同时,欧洲各主要国家通过建立东印度公司开始了海外贸易,进而演变为国家层次上的海外殖民掠夺。有研究发现,仅在印度,英国殖民统治就掠夺了9万多亿英镑的财富。总结起来,西方的现代化是“一进一出”式的掠夺。“进”即靠战争抢劫财富,《马关条约》使得日本掠夺中国2.4亿两白银,相当于日本几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从此跻身于世界强国并在1905年日俄战争中成为战胜国;“出”就是国内现代化进程中阶级矛盾激化,大量活不下去的底层人去海外成为所谓“殖民开拓者”,建立“新大陆”诸如美国和大洋洲。也可以说,西方现代化史也就是一部战争和殖民掠夺史,血腥且肮脏,这就是自由主义民主的“另一面”,也是真实的世界政治史。但是,西方国家为了在政治上给自己洗白,绝不提什么世界政治史,而是建立了所谓的“全球史:人类共同体史”,以研究物件历史的全球化而去国家性和去政治化。

中国的现代化是在西方支配的世界体系中进行的。“求解放”站起来的新中国,不可能像西方国家那样搞殖民掠夺,只能以和平发展的方式建设现代化,而且不输出革命,不制造战争和动乱,不制造人道主义灾难。对外政策,中国奉行的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内,自己吸纳消化现代化过程出现的各种社会矛盾。最终,中国通过和平发展改变自己并改变了世界,中国成为世界上120个国家的最大贸易国。1850年,东西方工业生产总值各占一半;1980年西方占90%而非西方国家只有10%;2020年,这个比率又回到1850年的水平。GDP占比的背后是国内

政治,这意味着财富流向的变化,必然会诱发就业困难、社会保障水平下降等国内社会矛盾;同时也标志着世界政治权力的转移。

中国是世界近代史上第一个以和平而非战争、以互惠贸易而非殖民掠夺的方式完成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现代性转型。即便如此,美国还要纠集一些国家打压中国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机会。

### 四、现代化结果

在16、17世纪之前的前现代化时期,虽然有“十字军东征”之类的“文明的冲突”和欧洲内部的宗教战争,但各文明体之间是平等的,不存在支配与被支配的状态。18世纪即英国工业革命之后,“西方的兴起”建立了盎格鲁—撒克逊人主导的、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体系,这个体系不平等且血腥。世界体系的不平等性自不待言,正如麦克尼尔父子的全球史研究所展现的那样,欧洲民族是世界上最好战、最野蛮的民族。由此产生的欺凌性不但针对非西方国家,就是在西方阵营内部也是倚强凌弱,比如美国禁止日本发展半导体产业、强行肢解法国阿尔斯通公司、强迫英国不得采用华为5G技术。对阵营内部的小兄弟尚且如此,就不难理解冷战后美国为什么要不断发动战争而制造大规模人道主义灾难了,对于美国人来说,战争就是游戏,是他们的生活方式。

不满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主导地位,法兰西人、日耳曼人、意大利人和日本人先后发动霸权战争,均以失败告终。但是,俄罗斯人在一战中通过“十月革命”而建立的苏维埃政权以及随后建立的社会主义阵营,决定性地撕裂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俄罗斯以巨大的牺牲而改变了世界秩序,否则非西方国家永远憋屈地在不平等的世界体系中求生存。

沿着苏联的道路而“站起来”的中国人通过改变自己而改变了世界,世界出现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是,富起来强起来的中国贡献给世界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即以共商、共建、共享的方式而建设新型世界秩序。在“一带一路”倡议中,中国对其他发展中国家不是搞资源掠夺而让它们陷于“资源诅咒”之中,而是走与国内一样的共同富裕之路。研究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但就业率得以提升,经

济增长水平也明显高于此前。

300年来,如果说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现代化建立了不平等的乃至血腥和欺凌的世界体系,俄罗斯人则以大反抗的形式撕裂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而中国人正在让既有的世界体系更和平、更平等、更公正、更民主、更自由。中国人倡导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显然就是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

简言之,世界政治300年,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有能力、有可能把世界变得更平等、更公正的国家,文明体之间应该多元而平等地共存。

### 五、现代化模式的“政治”起源

从现代化道路、现代化方向、现代化方式到现代化结果等诸多方面,中国式现代化都不同于西方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本身就是一种不同于既有世界秩序的人类文明新形态。这种根本性的差异从何而来?历史政治学为我们提供了认识论意义上的知识图式。在历史政治学看来,历史本体论即历史的属性,决定了制度变迁方式,不同的制度变迁方式诞生了性质不同的政治理论(政治观念)。西方现代化之所以是商业集团主导的个体利益最大化的并以战争掠夺方式而建立了不平等的世界秩序,是因为自罗马帝国直到西方民族国家的形成,欧美历史都是社会史面向的,城邦国家林立,战争制造国家并催生了君主与领主权制约的代议制政府。这个长周期历史过程意味着,竞争性乃至对抗性分配资源,是欧美政治的主题。据此,霍布斯说政治就是“战争状态”,克劳塞威茨说“战争是政治的延续”,直到20世纪德国学者卡尔·施米特还说政治就是“划分敌友”。这些都是对社会史的真实描述。至于当下流行的诸如

马克思·韦伯说政治就是权力分配、戴维·伊斯顿说政治是“权威性价值分配”,都是对社会史的一种社会科学化表述。欧美社会史决定了其制度变迁中的个体利益性、资源分配上的对抗性以及现代化历程中的血腥性和不平等性。

比较而言,中国的周秦之变完成了从社会史向政治史的大转型,秦汉之制塑造了中国大历史。其实,从先秦开始,就有了大一统国家观,政治就从殷商的“敬天”、周朝的“敬德”演变为先秦时期的“民心”,即作为大一统的“正朔”必须拥有民心,而民心的基础是“致治”即民生得到保障。这样,“大一统一民心一致治”就构成了2000多年中国人的政治观,这也是一部政治史,即追求大一统、民心和致治的政治史。这个历史决定了,制度变迁方向必然是大一统的,即便在分治时期“各国”也在追求统一;而要统一必须以致治为基础的民心所向。2000多年的制度变迁方式决定了政治制度、政治行为和政治理论的“中国性”。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文明基体的一种延续和有机组成部分,作为现代化主导者的中国共产党必然是以国家统一为国家目标、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价值,以“孔子改进”的和平共赢方式而走向天下大同。

概言之,我们时代的好与我们时代的坏,都起源于本体性历史塑造的“政治”的概念。这个时代变得更好还是更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哪个政治概念更流行。

作者简介:杨光斌,河南省桐柏县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

(摘自:《教学与研究》2022年第10期)